

ZHONGGUO

GONGCHANDANG QICHINIAN

SHANGHAI

HUBANSHE

●主 编 刘 吉

●副主编 张 云 朱金元



中国共产党



七十年



2 022 5316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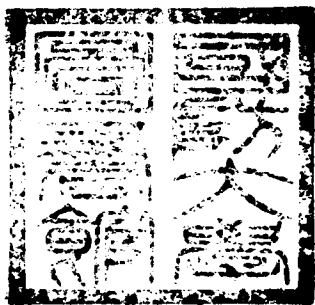
0007610

中国共产党七十年

(1921—1991)

主 编 刘 吉

副主编 张 云 朱金元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郝盛潮
封面装帧 杨德鸿

中国共产党七十年

(1921—1991)

主 编 刘 吉

副主编 张 云 朱金元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27.5 插页 4 字数 629,000

1991 年 6 月第 1 版 199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2,000

ISBN 7-208-01097-8/D·217

定价 9.65 元

目 录

历史的回顾·····	1
时代·社会·国情·····	1
民主·科学·启蒙·····	16

上篇 革命夺权

第一章 开天辟地的大事·····	29
中国工人阶级·····	29
先进的知识分子：“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思想”·····	37
从“五四”到“六三”·····	44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49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67
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	77
第二章 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下·····	84
从西湖会议到“三大”决议·····	84
国共首次合作·····	94
工农运动的狂飙·····	102
争取革命领导权·····	110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构架·····	122
推动北伐的胜利进军·····	131
与国民党决裂·····	141
第三章 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	161
向国民党打响第一枪·····	161

实现工农武装割据	168
中国革命道路的新思想	174
第二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183
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与中央苏区的形成	191
第四章 中国革命命运的转折	199
第三次“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199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红军长征	207
遵义会议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	214
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失败与长征胜利	220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228
反文化“围剿”的展开	232
第五章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39
瓦窑堡会议：党的策略思想的转变	239
推动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	247
白区工作的恢复和发展	252
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257
抗日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和苏区代表大会	264
第六章 毛泽东思想基础的奠定	270
中国革命的政治路线	270
中国革命的军事路线	275
中国革命的思想路线	280
第七章 实现全民族的抗战	287
七七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	287
全面抗战路线的提出	292
敌后战场的开辟	297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	303
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	310
肩负抗日主战场的历史使命	315
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浪潮	325

国统区各项工作的开展	333
第八章 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实践	341
边区的政权建设	341
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完成	345
巩固解放区的十大政策	353
延安整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	359
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370
七大：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375
第九章 力争和平民主的光明前途	384
“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384
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	388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393
自卫战争的战略准备	399
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	404
第二条战线	410
第十章 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416
刘邓大军挺进中原	416
土地改革与“整党”、“整军”	420
战略决战的伟大决策	425
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	431
挫败美蒋“和平攻势”	436
向全国进军	441
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	445

下篇 执政建设

第十一章 新中国的第一步	455
建立各级政权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455
多种经济成分的协调发展与国民经济的恢复	462
加强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的重大运动	469

为争取和平国际环境而奋斗	477
第十二章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484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484
反对高饶集团、维护党内团结	492
“三大改造”和生产资料公有化	496
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形成	509
一五计划提前完成和工业化的初创	518
第十三章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探索	523
探索任务的提出	523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的新思想	527
调动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积极性	533
八大路线	539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	545
第十四章 社会主义建设的歧途	553
从整风到反右	553
对反冒进的批判	563
大跃进浪潮	571
人民公社化运动	576
对“左”倾错误的有限纠正	582
庐山会议的逆转	587
第十五章 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	595
八字方针	595
国民经济大幅度调整的决策	602
政治关系的相应调整	610
调整任务的胜利完成	616
第十六章 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	622
“左”倾阶级斗争错误理论的升级	622
与苏联共产党的公开论战	628
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639

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	645
第十七章 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	650
“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650
从《五·一六通知》到《十六条》	656
“一月夺权”与“二月抗争”	665
制造冤假错案	670
“文化大革命”错误理论与实践的合法化	675
第十八章 与林彪反党集团的生死搏斗	682
开展“斗、批、改”	682
挫败林彪集团抢班夺权阴谋	687
《“571工程”纪要》与“九·一三事件”	694
纠“左”的努力及其曲折	698
从“批林批孔”到“评法批儒”	706
第十九章 粉碎江青反党集团斗争的胜利	711
“四人帮”组阁阴谋的破产	711
各条战线的全面整顿	715
错误的判断和决定	722
江青集团的覆灭	728
第二十章 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性转折	734
揭批“四人帮”的斗争	734
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	739
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确立	746
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754
新的“八字方针”	760
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完成	765
吹响农业改革的第一声号角	774
十二大：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纲领	779
第二十一章 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而斗争	780

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和对外开放	789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797
十三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	802
治理整顿、深化改革	806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	812
第二十二章 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823
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的确立	823
坚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方针	826
加强党的建设、完善党的领导	830
“一国两制”的方针和对外关系的准则	833
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建议的提出	837
结束语	845
后 记	865

历史的回顾

时代·社会·国情

自周秦以后，中国就进入了封建社会。二千多年漫长的岁月形成了历史，也形成了国情。

中国的封建社会维系于农业经济，因此，土地是基本的生产资料 and 主要财富。虽然在王朝兴衰与更替的周期循环中发生过地权的种种转移，间或还有过田制的变迁，但地权的大部分为人口中的少数地主所据有却始终是一种不移的事实。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分配，一方面带来了残酷的经济剥削，并造成地主与农民之间不可消解的阶级对立；另一方面，作为生产关系的既定前提，它又驱使缺乏土地的个体农民与地主结成租佃关系，向着零切分割的土地力作繁衍。在这个过程里，佃农和自耕农组成了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年复一年，土地为农民提供了生存资料，但零切分割的土地又限制了农民的视野和意识、活动和发展。劳动和土地的这种结合方式，历史地铸成了小农经济的种种特点：（一）以一家一户为基本单位，实现生产和消费的自我循环；（二）周而复始的简单再生产；（三）家庭手工业与农业结合。这些特点构成了自然经济经久不变的内容。因此，自然经济的自给性与保守性是两位一体的。与中世纪欧洲封授世袭的庄园经济相比，土地私有和买卖是中国封建社会独有的现象。私有和买卖，常常导致土地因兼并而集中，并周期性地形成社会危机，

触发民变和农民战争以致王朝更替。但私有和买卖，也常常通过分家析产、人事起落、境遇变迁而导致土地由集中而分散。这个过程，使对立的经济等级之间，有可能发生个别成员贫与富的相互对流。特别是每经过一次王朝更替，都导致了土地所有权大规模的转移与分散。由此产生的“君子之泽，数世而斩”，又说明了财富占有权的非连续性。它为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提供了绵长的韧性。

这一经济形态派生了君权专制下的官僚政治制度。金字塔式的官僚政治体系像神经系统一样实行着自上而下的控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君权高于一切，维系着一个疆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政治上的“大一统”；作为世卿世禄制度的否定物，官僚制度以设职授官代替了血缘世袭，“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君轻民贵，又显现着中国特有的民本意识。官僚体系与民本意识相辅相成，形成了中国官僚政治制度两大生命支柱。这种制度，在其始初，无疑包含了许多历史的合理性。但官僚制度的存在，本是以广大人民丧失政治权利为前提的，在官僚面前黎庶贱如土荳草芥。这种制度可以有限地容忍民本意识，却永远不会容忍民主意识的萌蘖。而封建秩序的排它性，又决定了守护封建秩序的官僚制度顽固的守旧性。从秦汉到明清，这个制度逐渐并且越来越严重地梗阻了社会的进化，成为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观念露头的堵截物。它不仅造成了新旧嬗递的滞迟，而且酿发了官僚制度和官僚群体的昏浊和腐败。腐败的东西本应在历史的代谢中衰亡，然而自隋唐以后官僚政治与科举制度的结合却又使它获得了一种富有张力的弹性。比之两汉魏晋以门阀荫选官的察举征辟和九品中正，科举制度提供了布衣入仕的门径，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选贤任能的可能性。随之出现的不同政治等级之间个别成员贵与贱的相互对流，曾有效地和缓了官僚政治

造成的社会对立和社会紧张。封建的政治制度因之而得以穿过王朝的改姓换代,在中国长期延续。

由经济形态派生的另一类社会组织是家族制度和行会制度,它们与君权专制下的官僚政治交融互补,系结了城乡社会关系,构成中国特有的社会调节物。家族组织以血缘为纽带,以农村为区域;在“敬宗收族”观念的支配下,依靠家谱、族规、宗祠、祖塋的粘合,形成富有凝聚力的宗法群体。这种群体不可能消除阶级对立,但对挣扎于个体经济中的小农来说,它毕竟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提供了来自同一血源的联系和庇护。因此,宗族犹如家庭的放大,有其温情脉脉的一面。然而,联系和庇护同时又意味着限制和管束。这种限制和管束的基本精神是“孝道”：“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未之有也。”^①在家族制度下,个人是注定要被家族淹没的。而孝亲与忠君的同一,又决定了族规和国法的同一,它对于不忠不孝者的苛严无情常常与官家刑律不相上下。与官僚政治相比,家族制度更富社会性、普遍性和包容性。通过这种制度,成千上万分散的小农被捆绑在纲常与伦理之中,在备受封建秩序压迫的同时又蒙昧地成了封建秩序的撑垫物。行会以同业为纽带,或称会馆,或称公所;是城镇区域中手工业者和买卖人的社会组织。工商业者多谋食于异乡,比之宗族关系里的个体小农,他们更加孤立。因此,以“行”为主干的同业内部联合正带有非常明显的互助性。但联合一旦形成就会产生种种具有垄断性的规矩和章程,既联合排他,又用以范围联合体中的人们。虽说工商不同于农业,然而在中世纪的中国,工商又是附属于农业经济的。这种特点,决定了行会的规约会具有维护一行一业现状的浓厚保守性。

^① 《论语》,《学而第一》。

而生成于行业利益的保守性，就其本性和归宿来说都会成为现存封建秩序的加固物。在这一点上，行会与宗法关系下的家族制度非常相似并互相渗透。中国社会分士农工商为四民，但四民都被家族组织和行会组织所包纳。因此，在历史上它们比所有存在过的王朝具有更旺盛的绵延性。

自然经济形态、官僚政治制度和家族与行会构成的社会组织，连同汉代以后独居一尊的儒术汇成了中世纪中国的历史环境。这是世界上最完备的封建社会制度。在这个环境中曾经产生过强盛的国力，也产生过影响东方和世界的文化和器物。但是，封建制度落后的西方人更早地走出了中世纪，自从欧洲出现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他们与东方之间产生了巨大的时代差距。资本增值的内在冲动和商品竞争的外在压力推动资产阶级走向世界，并且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在这个过程里，西方的使者、商人教士在先进技术武装的暴力卫护下走向东方，先后控驭或占据了我国周围的邻国，由此造成的侵逼之势已经置中国于环伺之中。1840年，以鸦片贸易为导因，英国与中国之间爆发了第一场侵略和反侵略的近代民族战争。

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正面临着（康乾）盛世已经过去，衰世卷地而来的窘境。在“积弊相沿”之后，吏治的腐败和齷齪久成官场惯态。其间贿赂公行，往往以国帑为夤缘之具，致使一县“有亏空十余万者”比比皆是，而“一过奏销，横征暴敛，挪新掩旧，小民困于追呼，而莫之或恤”。^①在社会的另一头，则是会聚于各色民间教门的下层人口起伏不绝的造反与民变。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震动川、陕、湘、鄂、甘五省的白莲教起义及其透迤不绝的滔滔余波。这些社会矛盾反映了地主阶级与农民

① 转引自肖一山：《清代通史》卷中，第260页。

阶级的激烈对抗，它们代表的历史主题本属古已有之。但是，与前代相比，这个时候多难的世局中又有着阶级矛盾不能全部包罗的内容。其一，人口剧增造成的社会困顿。明清嬗递之际，中国人的总数大约是六千万，康熙年间多达一亿；乾隆五十八年（1793）增至三亿；到道光十四年（1834）已超过四亿。在不满二百年的岁月里，人口增加了近七倍。与汉唐宋明相比，这是一个空前庞大而且沉重的数目，“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为士者十倍于前而佣学授徒之馆不加增”。人口的增长已远远地走在了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增长的前头。“于是士农工商各减其值以求售，布帛粟米又各昂其值以出市，此即终岁勤勤，毕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不肖者遂至生攘夺之患矣”^①。当狭隘的自然经济无法容纳日多一日的人口之后，一部分人就不不得不游离或半游离于社会生产之外，成为游民或近乎游民。这种多余的人口常常在求食过程中被下层社会的秘密结社所吸引和接纳，成为南北会党不竭的来源。众多的会党和秘密结社，既是中国社会矛盾和动荡的产物，又以自己的存在和活动，极大地加剧了中国社会的矛盾和动荡。其二，西方人用鸦片换走白银导致国计与民生皆穷。鸦片从域外经过走私贸易进入中国并不始于道光一朝，但到道光年间被烟土攫走的纹银每年已“不下数百万（两）”。逐年累积，流通中的白银因之而日见短少。由此造成的“银价愈昂，钱价愈贱”，一方面使归缴国库的地丁漕粮和盐务、关税经钱银折耗而日趋亏绌；另一方面又使以力谋食的人们更直接地受到了额外的勒索：“小民计工受值皆以钱，而商贾转输百货则以银，其卖以市也，又科银价以定钱，是故银少则价高，银价高则物值昂。又民户完赋亦以钱折，银价高则折钱

① 洪亮吉：《意言》。

多，小民重困”。^①除了经济侵蚀，在同一个时间里，鸦片的烟雾还熏黑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和纲纪，噬噬了中国人的精神和体力，寝成水潦旱魃之外的另一种巨殃。西方人运来的毒物，与晚清本来的王朝危机多方面地交织在一起，合成了千疮并溃，百孔洞穿的末世相。因此，由鸦片贸易触发的中英战争，既是正义的自卫与非正义的侵略之间的对抗，又是一个虽是发达的但正拖着种种病象没落的封建社会与虽是初起但代表先进生产方式蒸蒸日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抗。两者的较量，使正义的一方屈辱地成为战败者。

这是一场民族战争，但又包含着新旧相逢的时代内容。所以，战争的结局不仅判定了中西之间的军事胜负，而且用暴力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旧轨。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因扭曲而变态的近代化：

一、产生于炮口逼迫下的《南京条约》、《五口通商章程》、《虎门条约》、《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使西方人割取了一部分中国的领土，并轻易地获得了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权、海域航行与停泊权。这是他们用条约制度“改造”中国的开始。随后的一百多年里，中国和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多达一千六百五十七个。这些条约迫使中国从华夷秩序走向近代世界，并以种种传统之外的东西改变了二千年来固有的旧物。外来的逼拶使中国社会不能不发生变化，但外来的逼拶又阻断了中国社会的内在发展，在困扼中形成的是一条半殖民地畸路。条约制度下的半殖民地化，饱含着一个民族在铁和火、血和泪中的呻吟，但由此激生的民族矛盾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正因之而成为中国近代百年的一个历史主题。

^①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七，庚辰杂著二。

二、“公行”制度的取消和通商口岸的开放，使原本锁国闭塞的中国出现了巨大的裂口，来自西方的机器产品和经济关系沿着这些裂口以日益增多的流量泻入了中国的沿海和内地。在它们所到达的地方，延续了几千年之久的自然经济在商品经济的冲击和诱导下开始一层一层地瓦解。这个过程显示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在东方的延伸，其无情的掠夺性是非常明显的。然而，在自然经济退缩所留下的空间里，外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膨胀也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萌生，于是，在封建社会内部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和阶级力量。它们的产生和积累代表了社会的进步。但是，作为条约制度下出生的民族资本主义，它们与外来资本主义的竞争从一开始就注定只能苦居于劣境之中；作为自然经济的历史否定物，它们的生存和出路又无时无刻不面对着封建制度的桎梏与抵拒。其发展的迟缓和数量的微弱同时正说明了社会进步的困阨。于是，一方面，自然经济的破产造成了一批又一批失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承受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阵痛；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老是长不大，其狭小的天地没有足够的广度可以容纳这些人，因此，他们也承受着新生产方式发展不足的苦痛。这种矛盾是严酷的。他们中的多数人在饥饿的驱赶下不得不退回原地，在更加艰辛困苦的条件下重建自然经济。但由此碾逼出来的生存韧性，却不可避免地增固了自然经济和传统制度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抵拒。变态的循环使广垠的自然经济与孱弱的资本主义经济长久地并存于同一个时代和同一个民族。经济变迁的艰难又制约着政治和文化变迁，整个中国因此而两头不到岸，变为一个半封建社会。这是一种中世纪堵挡了近代的社会，新的经济形态和社会关系虽然代表着历史的合理性，却难以绕越已经失去了合理性但又基础坚固的旧制度。这个过程，使多数中国人备受磨难，也使人民大众反封

建的斗争成为中国近代百年的另一个历史主题。

鸦片战争后十六年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二十三年爆发了中法战争；中法战争后十一年爆发了中日战争；中日战争后六年爆发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可以说，民族战争贯穿了十九世纪的最后六十年。在这些战争里，地主阶级当权派曾经是抵御外侮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由此表现出来的重建民族藩篱的努力，与外侮刺激下连绵不绝的民众自发反侵略抗争无疑有着相同的一面。其间出现过殉国的将官，也出现过捐躯的大吏，他们和众多牺牲于民族自卫的义勇和乡民一样显示了爱国主义。但是，作为代表传统社会的一个群体，地主阶级当权派的反侵略意愿正是以守卫封建制度为宗旨的。对于他们中的多数人来说，这一宗旨既促成过反侵略，又限制了反侵略。其一比之古时华夏与夷狄之争，近代中国的民族灾难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扩张。因此，在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之间同时又存在着两种社会形态的历史差距。这一差距决定了被侵略的中国只有在实现自身近代化的过程中才能战胜近代化了的侵略者。然而，归宿于守护封建制度的反侵略意愿却注定不会自觉地选择这条道路，它们更多地指望用旧社会形态孕育出来的力量打败来自另一种社会形态的敌人。在资本主义强横扩张带来的历史剧变面前，民族战争与卫旧的同一不能不导致民族战争的一败再败。其二以守护封建制度为立场，地主阶级当权派会因民族矛盾的激化而走向反侵略；但在民族战争失败之后，为了守护已经残破了的封建制度，地主阶级当权派又会在创深痛巨中走向屈服和妥协。由此产生的中外和局，保全了清王朝的宗庙和社稷，同时却把中国社会更深地推入了半殖民地。屡败之后累续的屈服和妥协，使当权的地主阶级一步步地沦为外来资本主义的附庸。这种变趋，反映了以卫旧为内容的民族心理防线在压力下